

新意迭出,未来可期: “第四届抗日战争史青年学者研讨会”综述

王峰 江沛

时逢纪念全面抗战爆发 80 周年之际,由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和中国社会科学院《抗日战争研究》编辑部共同主办,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协办的“第四届抗日战争史青年学者研讨会”,于 2016 年 6 月 2—3 日在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天挺阁举行。国内外众多高校和科研机构的青年学者提交应征论文 132 余篇,主办方聘请专家评选出 35 篇参会。在保证质量的前提下,入选论文尽可能关照到目前抗战史研究的各领域,为会议的学术性、覆盖性和高质量的研讨奠定了基础。主办方特邀来自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南开大学、南京大学、南京师范大学的 9 位知名学者与会,同参会青年学者展开了学术上的深度交流,并进行了具体指导。现将会议论文及研讨的主要几个方面总结如下。

一、战时中共组织建设相关研究

中共在抗战过程中为什么能够成长壮大,进而夺取革命胜利,一直是一个国际性的话题。以往的研究多从中共政策效果切入,现在逐步转入从中共基层组织建设的具体分析展开,争论很多,日益深入。此次会议有五篇论文涉及于此。

赵诺(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的文章《抗战相持期中共华北根据地干部的进退升降》,考察时间范围是 1942 年前的抗战相持阶段。他以百团大战后日军对华北根据地进行“大扫荡”为中心,讨论了晋冀豫根据地干部队伍遭遇严重损坏的情况,并以此为背景分析华北各根据地干部的培养、任用、升降、甄别等内容。中共为渡过艰难时期推行的“精兵简政”政策,对华北根据地党组织的干部发展形成了约束。在战时特殊条件下,中共在干部选用、分配标准上强调最多的是工作能力,并不过分拘泥于政治信条,但“审干”始终贯穿其中,也根据现实需要对能力与忠诚度进行取舍,充分体现了中共在干部政策上的灵活性。中共对阶级成分问题的处理时有妥协,主要是因为基层干部过少,从长期考察看,强调阶级成分依然是中共干部队伍建设的重要指标。

程斯宇(南开大学历史学院)的《中共华北抗日根据地的整风审干运动》一文,以 1942 年的“延安整风”运动为背景,重点关注了以往学界涉及不多的华北各根据地的整风审干运动。全文以翔实史料展现了各地整风审干的情形,在强调其增强战斗力、凝聚力的同时,也对因残酷斗争环境、中共组织原则、群众力量使用不当以及领导者意识偏差等众多因素形成的过火行为进行了分析。他认为应客观认识中共在抵御侵略者的同时,也要与伪顽势力进行斗争的复杂环境。应回到历史的

生存环境中客观思考开展审干反奸的必要性。

杨豪(河北大学历史学院)的《差异之相:华北抗日根据地乡村党员与生产运动研究》一文,充分展现了华北抗日根据地乡村党员在生产运动、经济建设方面的积极作用,并认为这构成了中共政权深入发动基层群众的基本过程。文章客观呈现了生产运动中一些乡村党员的另类行为,认为这与根据地客观环境、基层制度、乡村传统等因素均有关联。

李玉蓉(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提交的《从进入山西到立足太行(1937—1940)——试论八路军后勤供给与军事财政的创建》一文,以八路军出兵山西为起点,考察了八路军从最初依靠国民政府军费供给,到立足山西就地筹款、合理负担并整顿根据地供给秩序,最后建立独立的军事后勤供给制度的全过程。文章指出,八路军供给制度的优势,就在于供给机关纳入军队组织,在同一系统下统一运行,效率极高,八路军经济独立的同时也强化了其抗战的独立自主性。

郭宁(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在《中共游击战略的转变与第一纵队的兴废》一文中,讨论了战时中共在山东成立规模最大的第一纵队的原因及取消过程,对第一纵队在“巩固华北、发展华中”战略实施中的影响,以及八路军一一五师与第一纵队间指挥失调等情况对山东中共武装力量的统一造成延误等问题进行了详细论述。

何志明(四川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提交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东北地区的早期实践(1931—1936)》一文认为,九一八事变后,中共中央与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在东北地区抗日统一战线政策上分歧较大。中共中央因南方苏区面临国民党军“围剿”而无法客观掌握东北时局,直至瓦窑堡会议前中共中央仍坚持土地革命和“下层统一战线”的方针,不利于东北统一战线的开展。此时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根据“上层联合”的判断,努力整合东北抗日义勇军的力量,对于推动东北抗日统一战线形成发挥了重要作用。

杨东(天津商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的《循名责实——中共关于“抗日战争”的概念表述与话语行动》一文,视角独特,细致考察了“抗日战争”的概念内涵在中共话语体系中的演变。他首先梳理了九一八事变前到七七事变爆发后中共关于“抗日战争”的理论自觉与话语表述,随着抗战持续深入,这一概念逐步升华为“民主即是抗日”“抗日战争即是农民战争”和“‘抗战’即是‘革命’”的理论阐释。作者最后比较了国共两党在抗战理论阐释上的差异性,从理论形态的侧面论证了中共夺取中国革命胜利的合理性。

二、国际视野下的中国抗战

中国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亚洲主战场之一,中国独立抗战功不可没,中国所以能抗战到底也与国际局势变化、盟国支援密不可分,因此研究抗战必须具有国际视野。

陈海懿(南京大学历史学院)与郭昭昭(江苏科技大学人文社科学院)合作的《国际性与主体性:中日冲突和国际联盟调查团产生研究》一文,以九一八事变后国民政府极力将中日冲突上诉国际联盟、寻求国际力量遏制日本为大背景,以国联调查团的产生为主线展开分析,认为国联调查团是多国合力作用的产物,日方在其中占有重要地位。文章对日军侵华之际英美采取绥靖政策的根源进行了客观分析。

九一八事变后,受到日本战略威胁的苏联如何对日令人关注。解永春(北京大学历史学系)的《九一八事变后苏联对日“不干涉”政策再探讨》一文,以新史料和新视角分析了此时苏联面临的远东局势,对苏联所以对日采取“不干涉”政策的内在逻辑进行了探讨。

王宇昕(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的《从待机观变到反对变局:美国政府对华北伪政权出笼的

王峰 江沛 / 新意迭出,未来可期:“第四届抗日战争史青年学者研讨会”综述

关注及应对》一文,以20世纪30年代美国奉行“孤立主义”的外交政策为背景,以维护本国战略利益为出发点,以避免激化美日远东矛盾为前提,详细论述了美国对华北伪政权的关注及其前后矛盾的态度。

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美日关系持续紧张,陈志刚(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的《1939—1941年美国在华撤军问题初探》,详细讲述了此时美军撤离中国时多方力量的纠葛、美国政府内部最初对撤军的意见分歧、撤侨与撤军先后次序、撤军的负面影响以及美军决定撤离中国的全过程。

美国援华联合会一度被认为是战时美国最大的抗日援华团体,它统一协调美国各地援华募捐活动并提供对华援助。施彦(人民教育出版社)的《抗日战争后期国际组织医疗援华中的矛盾和影响——以美国援华联合会和美国医药助华会个案为研究》一文,剖析了美援华会和美医药助华会的活动,对其在援华具体方案、物资分配等方面的诸多分歧、机构间矛盾进而影响援华工作效果等诸方面进行了考察,同时也注意到国际援华组织与中国医疗组织间的矛盾。正是内外多重矛盾的交织,对战时医疗救护事业产生了比较复杂的影响。

夏清(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的论文《“民族”“亚洲”与“国际”——1943年共产国际解散后的三方叙事》,论述1943年共产国际解散后各种政治力量的应对,国民政府以“民族至上”为基础要求中共解散,日本及汪伪政权则以“大东亚共同体”为基础的“民族”思想歪曲解释“共产国际解散”事件,歪曲世界现状和战争历史,强化以日本为主导的所谓亚洲“民族”认同感。中共既对上述舆论进行有力驳斥,又在力保反日大局前提下区别对待国民政府与汪伪政权,作者对中共政治策略的细致考察饶有趣味。

施建光(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的《中国政府对法国殖民军败退入境及战后重返印度支那问题的处置》一文,讲述从印支成立到日法合作统治印度支那,再到因三九事变法国殖民军败退进入中国广西和云南的过程,详细分析了国民政府对在华法国殖民军的安置和返回印支的措施、利益选择及其对越南政治格局走向的影响。

三、军事史视角下的国军抗战问题

抗战时期,军事战略的演变、指挥水平的提升以及军事技术的更新,是研究抗战军事史不可缺少的视角,可以据此分析中日军力差距以及战场形势。然而,囿于大部分学者军事知识的储备有限,从军事史角度研究抗日战争史研究的作品较为缺乏。此次有五篇论文从个案角度切入这一主题,令人耳目一新。

叶铭(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的《抗战时期军令部作战指导业务初探》一文,对较少关注的军令部内部系统进行了考察,分析了战时统帅部、参谋总长、蒋介石侍从室与军令部的作战业务指导间的关系,对军令部内部机构运转、作战指导流程进行了细致考察,并以豫湘桂战役为例检讨了军令部的作战指导业务,认为其内部存在着指挥层级过多、指导业务水平低、情报系统差等问题,大大降低了国军作战的指挥效能。

金之夏(北京大学历史学系)的《淞沪会战中的中国军队——基于国军内部的观察与反思》和于宁(南京大学历史学院)的《兰封会战中蒋介石的情报误判与越级指挥》两篇论文,以两个战役为个案,探讨了国军战时指挥系统的运转问题。前者以淞沪会战后德国军事顾问对中国军队的观察与建议、参战将领对会战过程的回忆与思考为基础,分析了国军在淞沪会战期间暴露出的指挥与协同、战术与战法、组织与制度上的问题,涉及国军内部派系众多、人事关系复杂等因素,中下级军官素

质偏低难以有效贯彻指挥制度与作战规则,导致国军战斗力也因此受到了负面影响。后者则以兰封战役为例,分析了蒋介石在战役中时常越级指挥的现象,指出这虽有纠正国军现代化程度不足、指挥系统不灵活弊端的努力,但因信息变化过快、情况不明常致前线指挥系统紊乱甚至战役溃败。

陈默(四川博物院)的文章《发展历程、武器装备、作战体系:抗战后期国民党军中的美械部队》,以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美全面军事合作为起点,重点考察国军三支美械部队的发展及中美围绕合作产生的矛盾与冲突。作者对比战前中德军事合作、战时中苏军事合作后认为,中美军事合作的内涵较前更为复杂,美方在合作中对国军掺杂了更多的军事、外交、政治诉求,一定程度上制约了中美间的军事合作,对美械部队的作战力也形成了一定的影响。

战时保证兵源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关键在于兵役制度能否有效运行。姜涛(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在《战时国民政府兵役管区制度之研究》一文中,以军政部下辖、直接运作兵役制度的机构兵役管区为考察对象,梳理了战时各兵役管区的制度规则与运作实态,分析了围绕兵役管区、军政机构、前后方的合作与冲突,加深了读者对于战时国军兵源工作的认识。

四、战时国统区政治与社会形态

全面抗战爆发,中国政治形态发生了重大变化与调整,国民政府被迫迁往重庆,也引发了中央与地方关系间的诸多问题,关乎抗战前景及坚持抗战,意义重大。

马琳(复旦大学历史学系)的《战与和之间的折冲者:孔祥熙与西安事变的解决》和孙扬(南京大学历史学院)的《青年孔令侃的“抗战实践”——以南尖社为中心的考察(1936—1939)》两篇文章,关注到孔祥熙父子的战时活动。前文以“主和派”定位西安事变时期的孔祥熙,深入探析了其在事变中所扮演的角色,指出其为实现和平斡旋于“讨伐派”和“主和派”间,事变的最终走向与其奉行“主和”思想有一定的关系。后文认为,学界以往研究多揭露孔氏父子战时在军火贸易中“中饱私囊”,但也应该看到孔氏父子的抗战活动。它详细考察了以往极少论及的由孔令侃发起组织的南尖社的一系列秘密抗战活动,包括承担对日交涉和中德贸易的相关工作,对日、英情报收集和暗杀附敌分子的活动,这些活动导致南尖社被香港警察发现被迫解散,孔令侃离开香港。

谢健(南开大学历史学院)的《地方利益博弈与国民政府的基层治理困境——战时三峡实验区改县研究》和张杨(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的《国家财政、租佃制度与土地收益分配:抗战时期川西地区的地主与佃农》这两篇文章,均关注战时后方基地四川省。前文认为,国民政府战前难以有效控制四川,战争期间才将权力深入四川地方。谢健以三峡实验区改县事件为个案,考察了中央权力在深入四川基层时遇到的困境,认为国民政府对四川基层的控制是失败的。后文从经济角度考察了1941年实行的田赋征实政策,认为由此形成了四川省对国民政府财政的强力支撑,其资源贡献居全国之首。

陈钊(南京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的《“没有群众”:胡庶华与战时西大校政》一文,考察了战时国统区的大学教育。该文论及胡庶华调任西北联大后的一系列活动,还原了担任校长和被陈立夫撤换的经过,重点论述了胡庶华退出西北联大背后派系力量复杂的纠葛,解析了战时大学校政走向与派系力量间的复杂关系。

王余辉(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的《以战争与民族英雄建设现代中国——抗战时期国家纪念空间忠烈祠的诞生》一文,关注战时国民政府在全国多地兴建忠烈祠这一历史现象。他认为,战时国民政府以纪念民族英雄为媒介,强化民族国家和国民党政治权威的观念,以促进在更大范围内和更大程度上推动抗战动员和国民党政权合法性的构建。

五、战时边疆区域问题

抗战全面爆发后,国民政府内迁西南,原本中央权力无法深入的边疆地区,此时或邻近政治中心、抗战中心,或成为重要的资源供应地,权力的空间格局发生重大变化,中央与地方权力间随之产生众多交叉与碰撞,这是理解抗战大后方政治与社会变动的重要方面之一。

苑琛(复旦大学历史学系)的《国难与民变:抗战前后国民政府在边陲地区的治理困境》和赵崢(华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的《中央政争背景下的边疆民族政策——抗战时期国民政府与西康省政府对西康宁属彝族地区的治理》两篇文章,都以战时国民政府权力中心西迁后,中央与地方力量间的碰撞与摩擦为问题意识。前文重点考察国民政府在鄂西推行新县制,旨在筹措财政经费,加强社会控制,同时导致地方行政系统的官僚化、地方社会失序和民众额外负担的加重。后文主要考察了国民政府与西康地方势力争夺彝族控制权的明争暗斗。国民政府推行一系列政策,培植彝族代理人,彝族地位得到了提高,但权力争夺贯穿其中,治理困局难以有效解决,彝族基层民众生活改善其实不大。由于战时彝族政策推动,其对外交流得以加强,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彝族内部的后期整合。

李佳佳(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的《因运而生——抗战时期西北驿运再研究》和王峰(南开大学历史学院)的《滇缅公路与战时云南 1937—1942》两篇文章,以西北、西南地区重要交通线及其战时功效为切入点,解读西北驿运及滇缅公路所担负的物资运输重任。前文指出,因交通运力不足,原本被弃的驿运,战时再次成为西北地区军民运输的主要方式之一。它详述了西北驿运机构、制度设立及路线设置,重点考察了驿运中军、公物资运量的情况,客观分析了驿运制度的各种问题,解析了驿运行业的困境。后文主要考察了滇缅公路开通及其对沿线地区经贸发展所产生的积极影响,同时客观分析了其军需特性及维护成本过高等因素,指出该公路对沿线民众生活及生产的负面影响也不可低估。

六、日本视角下的抗战研究

受制于日文材料使用有限,抗战史研究一直存在着对日本政治、军事、社会、战争动员工作等方面研究深入不够的问题。本次会议有数篇文章大量使用日文材料阐释相关议题,令人鼓舞。

石户谷哲(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提交的《土肥原贤二与华北事变研究》一文,以日本防卫研究所和外交史料馆档案等日文材料为基础,详述了1935年土肥原贤二作为关东军代表在策动“华北事变”过程中的作用,认为“华北事变”从外表看为日方蓄谋极力推行,但内部一直存在分歧,关东军与天津驻屯军、陆军中央部存在着相当的不协调,各方势力因事态发展而态度时有变化,土肥原贤二居间协调,发挥推手作用,使关东军、天津驻屯军、陆军中央部合力推动,从而促成了“华北事变”的发生。

贺江枫(南开大学历史学院)的《1940—1942年阎锡山与对伯工作的历史考察》一文,讲述了1939年晋西事变后阎锡山面临诸方力量挤压、生存空间严重减少的背景,利用日方材料考察了日方对阎锡山的拉拢和日阎接触,指出阎锡山对日合作态度,根据其对国际局势变化的判断而两次转变,从始至终,阎锡山始终没有明确投靠日本,其中蒋介石的恩威并施也对阎锡山产生了一定影响。

通过《抗日战争期间日本电通公司在中国大陆发行的中文宣传杂志》一文,曲扬(日本早稻田

大学政治学研究科)考察了日本电报通信社在中国沦陷区发行的中文期刊,这种“日产中文期刊”的特点是:强调日本支配中日合作,其内容多为日本政策的说明,本土信息少。随着战争激化,刊载文章更多是论述日本对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性。

高燎(北京大学历史学系)的文章《在乡军人与战败前日本社会动员》,关注到学界以往较少重视的日本在乡军人问题。在丰富的日文史料基础上,该文详述了与日本在乡军人产生有直接关系的日本预备兵役制度。随着战争扩大,在乡军人的动员及征招范围也逐步扩大。过度的动员,使得日本社会劳动力严重缺失,很多日本老少不得不从事繁重的劳动,战争对于侵略国民众同样是苦难。

谭皓(辽宁师范大学教育学院暨田家炳教育书院)在《试论近代日本外务省对华派遣留学生制度(1871—1931)》一文中,讲述明治维新后日本以国际关系原则处理对清政府的关系时,意识到汉语翻译人才的重要性,从1874年开始派遣赴华留学生,颁布多项留学规程。1919年后中国反日情绪高涨,在华日本留学生难以在中国学校学习,只能去日本人在华开办的学校,限制了日本留学生与中国社会的接触,留学意义大减。文章指出,部分留学生随后成为日军侵华战略的制定者和执行者,是造成日本近代赴华留学制度被指责的原因之一。

黄永远(韩国高丽大学韩国史学系)的文章《日本帝国与近代东亚的传统医药:从台湾、朝鲜到伪满洲国》,考察了汉方医学在日本废除与复兴的变化过程。汉方医学从废除到复兴在日本国内影响不大,其将“复兴”汉方医学逐步演变为“东亚医学”观念,与“东亚新秩序”“大东亚共荣”的解释相结合,为侵略行为寻求说辞。

综上所述,此次会议入选论文所展示的问题意识较强,视野开阔,史料充分,写作严谨,分析深入,令人深受鼓舞,某种程度上也代表着当前青年学者的研究水准,他们的学术素质、视野及认知水平都有新的提升。假以时日,必将承接持续推动抗战史研究的重任。《抗日战争研究》编辑部每年召开青年研讨会的做法,着眼未来,提前布局,必将对我国抗战史研究产生意义深远的影响。

[作者王峰,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研究生;江沛,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责任编辑:高士华)